

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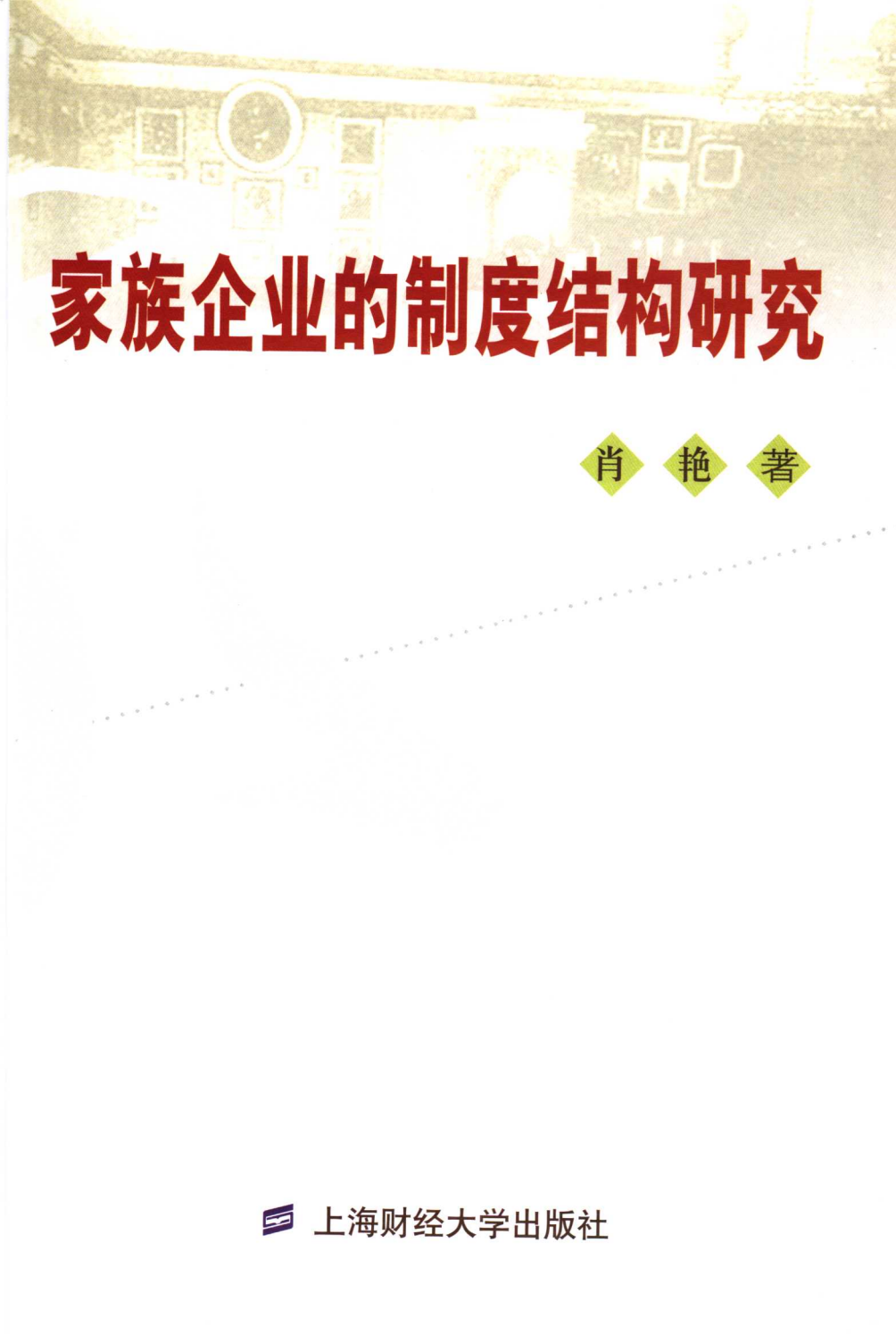
族企业的制度结构研究

JIAZU QIYE DE ZHIDU JIEGOU YANJIU

肖 艳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家族企业的制度结构研究

肖 艳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族企业的制度结构研究/肖艳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81098-585-X/F · 536

I. 家… II. 肖… III. 家族-私营企业-企业管理制度-研究-中国
IV. F27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7144 号

☐ 责任编辑 张惠俊

☐ 封面设计 周卫民

JIAZU QIYE DE ZHIDU JIEGOU YANJIU
家族企业的制度结构研究

肖 艳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装订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6.875 印张(插页:2) 172 千字

印数:0 001—2 000 定价:19.00 元

本书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言

为别人的书写序，其实是件很麻烦甚至痛苦的事——必须通读书稿才有序的思想信息；必须了解相关文献，才能说些不同于图书广告的话，使序不至于流俗。然而手头的这本书例外，作者是我的博士生，书稿是她的学位论文，思路和文献我当然熟悉。

家族制企业的名声在中国似乎并不好，究其原因，大家的说法高度一致：家长制、资本规模受私人资本积累和积聚能力的限制、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技术进步能力不足，云云。这些都是事实，家族企业在成长之初必然如此，因而，争论的余地并不大。有趣的是：我们当今看到的诸多国际著名大企业在基本结构上仍然是家族制；一般被作为比较对象的所谓非家族的现代公司，除了少数国家特许或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之外，几乎都有长期家族制的历史；迄今为止世界上家庭私人小企业的数量远远超出非家族公司的数量，而且大多数将持久顽强地存在并发展下去。这些历史事实和表面上的的是是非非似乎并不是本书作者的真正兴趣所在，在她看来，更有价值的问题是：家族制企业为什么会存在。这是一个看似简单而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感兴趣的正是这种学理性的研究。但我想补证的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草根上更容易长出企业家。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家队伍正在壮大，这与所有制结构及由之决定的竞争环境有关。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温州模式”其实不过是以私人个体经济为主体的模式，几乎全是家族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正是这种并不神秘的所谓模式，把政府与企业、企业内部各阶层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明了。苏南地区经营者队伍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规模整合，一部分“能人”失足落水，一部分退出企业，一部分勉强维持，一部分创业有成。近十年来，苏南地区企业家队伍迅速成长，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有的“苏南模式”彻底地改成“温州模式”了。最初的“苏南模式”本质特征是私人承包公共财产，这种模式下如果能够造就出真正的职业企业家，那一定是十分偶然的，但不排除培养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官员的可能，这是另外一回事。企业家成长需要适当的要素竞争环境、战略管理才能的形成与发现机制和财产关系，而这在原有的“苏南模式”中都不存在。最初人们普遍看好“苏南模式”，仅仅是因为人们希望它能够创造出将传统的财产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经验，走出一条不改革财产关系也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然而短短的实践就已经证明，问题不那么简单，“苏南模式”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反而自己也在进一步的市场化实践中逐步消亡。这一重大反复十分耐人寻味。人们终于发现，“苏南模式”未能培养出真正具有职业精神的企业家，培养出来的不过是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人，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不稳定，因此，他们比较理性的选择是把未来不确定的东西变成眼前确定的东西，企业和包括村民在内的财产所有者未来能否富裕并不重要，自己先富了再说。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的经营能力局限在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上了，而不是企业最大化市场占有率上，更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上。追求企业最大化价值，他就必须追求企业无形资产的增值，强调企业的信用，强调真正为客户服务，强化企业的

综合素质。如果追求短期利润,他没有必要做这一切,因为将来的利润可能与他无关。“苏南模式”的转换其实并不复杂,几乎是在没有经济学家提供任何理论智慧的情况下完成的。实践没有肯定“苏南模式”,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而改革其产权基础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也不需要经济学家多说什么。模式转换后的实践证明,企业产权主体的置换,使经营者成为财产的自然监护人,其财产收益预期稳定了,他没有必要冒道德风险。这说明,企业家精神与产权制度确实有一定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幅度小的地区,往往企业家精神也非常薄弱,企业家的队伍也总是难以形成。

冒险有两个极端的可能,一种是“成就”为企业家,一种是“成就”为囚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事实上,在资本积累机制、企业人才价值评判机制以及经理人才收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某人偏好于最大化风险,他就处在这两极之间。如果他偏好于风险中立,最大的可能是做高级白领。那些敢于冒险的人,如果没有成为囚犯,就极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在社会责任之外疯狂地追逐最大化利润,其风险行为最终使之沦为囚犯;他通过公平竞争获得他作为企业家所追求的东西,在社会责任范围之内追逐私利,其风险行为则有可能使之成为企业家。所以,对于冒险,我们必须看两面。想干又敢干,这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要素。风险偏好型的人,有成为企业家和囚犯两种可能。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企业家在创业和冒险的同时,也往往造就这两种可能。马克思曾经不无极端地说,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问题是怎样把冒险精神引导到企业家精神。

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地通过个人理性、商业伦理、法律以及企业的社会合约来约束那些有最大化风险偏好的人,那么这些人可能好不过十年,往日的辉煌一夜间

灰飞烟灭,当他接近于最大化利润的时候,已经一脚踏进了监狱的门槛,恰如生与死之间亦不过是寸步之遥。所以,必须有约束。对财产权利的合理界定和依法保护,可以起到保护人才的功效,从而将冒险家引向企业家,这是产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产权并不具有超越世俗生活的魔力。在世俗生活之外,产权毫无意义。人只有作为世俗的人,产权才有意义。这里强调产权的约束功能,实际上是强调预期作为一个可以内生化的变量,会直接影响人的当前决策:作为或是不作为,去行善还是去偷盗,是积累财富还是挥霍财富,是撒谎还是坦白,是守信还是失信,是平衡风险还是铤而走险。对未来有稳定预期的人,可能也会幻想一夜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他往往不会为此孤注一掷,不会在法与伦理之外为所欲为;他会更注重自己和企业的信誉;会善待管理层和员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会善待股东,整合社会资源,支配更多社会资本。当他做到上述这一切时,企业在制度内的不确定性已经被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从而进入稳定运行状态。一个企业稳定与否,取决于三类因素:政治环境(包括经济与政治体制)、市场环境和企业组织本身。如果企业家不能改变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至少应该能够决定企业组织自身的价值走向。

现在人们有一种感觉,似乎浙江成了企业家的摇篮,特别是温州、宁波、台州等地。这些地区的企业最初规模都很小,却能逐步造就出一批企业家,其中有规律可寻吗?

人们的感觉是有经验基础的。浙江近二十多年来确实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企业家,温州和宁波最为典型。我们看一个投资者、经营者是否具备企业家精神,不是看企业的资产规模大小,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小企业可能变大,大企业也可能变小,关键看经营理念和创新精神,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产生这种精神内核的动力与社会文化环境和资源禀赋条件有关。温州能够造就出那么多企业家,一是由于温州历来人多地少,可耕地尤其稀

缺,光靠种植业养活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始终有一部分人被迫游离于农业之外,他们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寻求盈利的机会(马克思曾经如此描述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能在温州人的观念世界中成为无可置疑的美德;在其他地方需要艰苦的思想解放才能逐步接受和实践的事情,在温州人那里似乎是自然天成的事情;在其他地方被人们视为冒险的行为,在温州人那里只不过是正常的生活体验。自然禀赋条件的初始配置,造化了温州人行商的秉性。二是社会改革本身所提供的工商业自由发展的环境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环境。借助于这两种环境,政府部门在很多领域可以无为而治,私人部门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人们所崇尚的所谓“小政府”在这里成为现实,这倒多少应验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所谓“无为有为”的价值判断。环境影响人。在一个不存在“父爱主义”和“母爱主义”的制度背景下,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显得简单明了——你可以从权力中体会荣耀,我可以从货币财富中体会荣耀,传统社会中人对权贵的依附在这里被意外地淡化了。温州商人和企业家们可能尚未明白“市民社会”是怎样一种状态,而事实上,以经济市场化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和他们脱离农耕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已经营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三是财产的私有制。这是浙江企业家成长环境在总体上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根本基础。孟子讲过:无恒产则无恒心。这话未免过于绝对,有了恒产未必有恒心;但一般而言,没有恒产而只是暂时使用别人财产的人,要稳定他对财产的预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滥用资产,追求短期个人收益最大化。这是企业之大忌。传统的所谓“苏南模式”之所以消亡,根本原因也在这里,没有太多的复杂原因。资本的积累水平及其长期收益一旦进入投资人的目标函数,投资人至少在管理并增殖自己的财产问题上不需要任何人的监督,尽管他有可能借损人而利己(如制售伪劣)、借损公而肥私(如偷漏税收)。我们必须客观承认,财产关系带来的稳定预期

对成就企业家非常重要。

我们不排除国有企业里成长出企业家的可能,近年来名声日益辉煌的中国创业企业家里面就有一些是国有企业的老总,比如上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蒋志权、上汽集团总裁胡茂元,等等,但这也应具体分析。国有企业企业家的创业过程也包含了财产收益和个人努力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如果不解决这一点,这种创业精神可能没法持久。当企业家辛辛苦苦多年,仍然是个无产者,他可能会缺乏耐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都不是在传统体制基础上诞生的。传统的行政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不改,不可能有现在的建工集团、上汽集团。正是借助于国有资产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改造,才为企业家提供了成长空间,当然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在建筑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蒋志权能够把很多建筑企业整合在他的麾下,在社会范围内重新整合市场资源,靠的是创业精神。但这种精神也不是无源之水。由此看来,脱开具体的制度条件讨论企业家精神,没有太大的意义。

石磊

2005年5月28日于复旦园

摘 要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源远流长、久盛不衰。自企业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正逐步走向信息时代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无论是在已经历的,或是在正步入的社会形态中,家族企业都普遍地生存和发展着。而且,家族企业制度不仅在家族价值观浓厚的泛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占据重要地位,即使是在崇尚个人理性、社会信息传递渠道通达、市场相对规范的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里,家族经营和家族控制的企业仍然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在《财富》杂志的前 500 家大企业中,三分之一由某个家族控制,而它们都是世界上卓有成就的公司。具体就中国个案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重要力量的私营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具有鲜明的家族性。这些家族企业经历了由少到多,从传统行业到信息、生物等高新技术领域,从零星、分散的家族小作坊到跨行业、跨地域甚至跨国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快速发展。它们对中国的劳动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事实相悖的是,家族企业在经济学中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已经被现代公司制度所淘汰的前现代企业组织形态,以至于一提到家族企业,人们常会自然地和生产落伍、没有效率、裙带关系等种种负面评价联系在一起。如果家族企业制度是一种低效、落后的制度安排,那么,当今中外家族企业的普遍存在便是一种背离经济

人“理性选择”假定的现象。虽然,我们不否定家族企业是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相互融合的一种经济组织,但家族企业首先是一个在竞争性市场上谋求生存的经营实体,在自由竞争这一“看不见的手”的硬性约束下,家族利益目标的实现必须以企业盈利为前提。如果家族企业制度本身不存在效率基础,那么创业者及其家族的企业制度选择行为即使是对家族利益而言也是非理性的。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尝试着以现代企业制度的结构框架为参照系,建立一个用于分析家族企业制度结构的理论逻辑构架。本书证明,家族企业制度同样是由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制度及契约化行为约束机制这些不同的制度层面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而构成的。在这一结构框架内,本书逐一解析家族企业的制度构成要件,以经济学方法探讨经济主体对这种基于非交易合约的制度安排作出自愿选择行为背后的原因,从而对这种所谓“非理性”的制度结构作出可能的经济学解释。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本书认为,所谓“最优”的企业制度取决于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以及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之间的权衡,没有哪一种企业制度结构可以无条件地达到最优。

Abstract

Family firm, as a kind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form,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still prevalent without declining. Since enterprise came into being, human society has gone through agricultural, pre-industrial and industrial society, and now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technology. No matter in which society, the past or the coming, family firm wildly survives and develops. In the broad East-Asia where clan viewpoint of value is strong and the Confucianist culture is popular, the system of family firm occupies important position, even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developed market economies with advocated individual rationality, good social information transmit channels and comparatively standardized markets, the enterprise of clan operation and clan control is still a kind of universal and important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form. In the 500 top enterprises of the magazine of "fortune", one-third is controlled by certain clan, and they are the remarkable companies in the world that hav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case of China,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most private enterprise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bright clan characteristics. These family firms have gone through fast developments, from few to many, from traditional professions to the high and new technical fields such as information

and biology, from the scattered, clan little workshops to cross-industrial, cross-regional and even multinational large enterprise groups. In terms of labour employment, social stabi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tc., these family firms have the role that cannot be replaced.

In contrast to the facts, in economics, family firm is normally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the pre-modern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replaced by modern corporate system. So when family firm is mentioned, people usually connects it with various negative comments such as lagging behind production, inefficiency and petticoat influence. If the institution of family firm is a kind of low efficient and backwar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e universal existence of present Chinese and foreign family firms would be a kind of phenomenon deviated from the assumption of economic person's rational selection. Although we can not deny that family firm is a kind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at combines clan rules and enterprise regulations, family firm is at first a kind of operation entity which seeks survival in competitive markets, under the rigid restraint of the "invisible hand", the realization of clan benefit goals must be prerequisite with enterprise profit. If the institution of family firm does not have efficient foundation, the entrepreneur and the selection of family firm institution are irrational.

Based on above-mentioned knowledge, with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enterprise institution as a frame of reference, this book tries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ly logic structural frame for the analysis of family firm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is book proves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family firm is also composed of the institu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such as exclusive property system,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system as well as the contractual mechanism of behavioral constraint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In this

structural frame, this book analyze one by one the systematic components of the family firm, and with an economics method discuss the behind reasons for the voluntary selection of this kind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based on non-trade contract, so as to make a possible economic explanation of the so-called “unreasonabl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n the foundation of overall analysis, this book concludes that the claimed optimum enterprise institution depends on the balances between cost and profit and among variou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here is no enterpris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which can be unconditional optimum.

目 录

序言	1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Abstract)	1
1 引论	1
1.1 问题与背景	1
1.2 相关文献及简要评论	4
1.2.1 关于家族企业的界定	5
1.2.2 国内外关于家族企业研究的文献回顾	8
1.2.3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18
1.3 本书的研究思路、创新点和逻辑	21
1.3.1 研究思路	21
1.3.2 本书的创新点	22
1.3.3 对逻辑结构的说明	23
2 家族企业组织的形成	26
2.1 企业组织的源起	26
2.1.1 马克思关于古典企业形成的观点	27
2.1.2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说”	28

2.2	发达市场经济形成中家族企业的演变·····	30
2.2.1	企业初创期(1840年以前)·····	30
2.2.2	传统型家族企业的裂变期(184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32
2.2.3	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家族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35
2.3	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形成机理·····	40
2.3.1	中国私营企业选择家族式组织形式的制度根源·····	41
2.3.2	信任博弈与家族企业的形成·····	49
3	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与企业绩效·····	54
3.1	作为不完全合约的产权与家族企业产权制度·····	54
3.1.1	产权是不完全合约·····	54
3.1.2	企业产权合约的演进·····	55
3.1.3	现代经济中的家族企业产权合约:进一步的解释·····	57
3.2	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变迁与现状·····	59
3.2.1	发达市场经济制度中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变迁·····	59
3.2.2	转轨经济中中国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变迁·····	63
3.3	家族所有权的经济解释·····	69
3.3.1	古典家族企业所有权安排中的机会主义、团队生产、合约的不完全性·····	70
3.3.2	古典家族企业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	72
3.3.3	现代家族企业所有权安排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非货币收益、资本信号·····	74
3.3.4	现代家族企业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	77
3.4	所有权及其制度绩效——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对比分析·····	80